



竹韵红笺：薛涛的性别书写与地域文化实践

——以中唐士大夫传统为背景

**Bamboo Rhyme and Red Letter Paper: Xue Tao's Gendered Writing
and Regional Cultural Practice —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id-Tang Literati Traditions**

陈秋月

CHEN QIU YUE

20ALB06821

指导教师：余曆雄 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竹韵红笺：薛涛的性别书写与地域文化实践

——以中唐士大夫传统为背景

**Bamboo Rhyme and Red Letter Paper: Xue Tao's Gendered Writing
and Regional Cultural Practice —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id-Tang Literati Traditions**

陈秋月

CHEN QIU YUE

20ALB06821

指导教师：余曆雄 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Chen Qiu Yue. All right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回顾.....	2
第三节 论文构思与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成果预计.....	7
第二章 薛涛生平与中唐文化背景概述	9
第一节 薛涛生平概述.....	9
第二节 中唐文化背景概述.....	11
第三章 薛涛诗歌的意象突围与性别书写新变	14
第一节 地理空间与书写载体：浣花溪的文化意涵与薛涛笺创制.....	14
第二节 “竹”意象的双重象征：士人风骨与个体困境.....	18
第三节 题材突破与语言突破：薛涛诗歌语言的性别书写新变.....	20
第四章 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	24
第一节 薛涛与蜀地士大夫文化传统.....	24
第二节 薛涛与元白诗派.....	26
第三节 薛涛笺在中唐士大夫传统中的价值.....	28
第四节 薛涛性别书写之传统之内的突围.....	30
第五章 结语	33
引用书目	35
附录.....	39

表目次

表 1	薛涛诗中浣花溪地理空间相关诗作统计表.....	39
表 2	薛涛诗中“竹”意象出现频次统计表.....	39
表 3	薛涛存世诗歌主题分类统计表.....	40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陈秋月 CHEN QIU YUE

学号：20ALB06821

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

摘要

薛涛作为中唐时期兼具“乐妓—诗人—制笺人”三重身份的女性创作者，其文学作品与工艺创新在唐代女性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现有研究多将薛涛标签化为“才女”，多聚焦于生平轶事与诗歌文本的鉴赏，对其与中唐士大夫传统的深层互动、性别书写的内在逻辑缺乏系统阐释，未能充分揭示其创作与工艺实践的独特历史价值。本文以薛涛 93 首存世诗作与薛涛笺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互证法、数据统计法等展开研究。论文梳理了薛涛生平与中唐士大夫传统的核心内涵。从浣花溪地理空间重构、竹意象的性别转化、诗歌题材与语言边界突破、薛涛笺的媒介创新四个层面，论证薛涛性别书写的本质是“传统之内的突围”。揭示了薛涛在不颠覆中唐主流文化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实践。薛涛的个案表明，即使在性别秩序森严的古代社会，边缘女性创作者仍能在既定文化中寻得自我表达空间。本研究为唐代女性文学与古代性别书写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视角，也为理解传统社会女性创作者的表达思维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薛涛；性别书写；中唐士大夫传统；薛涛笺；唐代女性文学

致谢

二零二六年四月，本科生涯落定。行文至此，故事收鞘。

衷心感谢指导老师点灯照路，不仅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悉心指导与点拨，还在学习过程中给予鼓励与包容。愿恩师学术长青，岁月从容。

还要感谢求学路上的诸位老师，除感谢老师们平时的教导之外，还要感谢在每一次作业与提呈时都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特别感谢父母与家人，异国求学时的支持与信任是我安心前行的勇气。惟愿至亲平安顺遂，身体康健。

此外，感谢两位好友，在他乡求学时陪我度过无数时光，给我温暖与关怀。山长水阔，我们共同走过一程，愿万里相逢仍如初时。祝君昂扬向上，日后皆是坦荡通途。

谢没有现身但填满了每一个时辰的人，虽不能见面，但曾有同样的月光落在我们肩头。

最后，谢自己。于无光处独自掌灯，未曾退缩。此后长路，愿弦歌不辍。

四月如此清澈，

愿只身轻盈，心有栖处。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薛涛诗中唐文坛极具特殊性的女性创作者，她以其“乐妓—诗人—制笺人”的三重身份，活跃于剑南西川幕府，与韦皋、武元衡、元稹等士大夫诗文唱和，凭借诗歌与薛涛笺留名后世，成为唐代女性文学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史研究多聚焦男性文人，学界对薛涛的评价也多停留在“才女”标签化认知，或将其置于情爱叙事、乐妓身份、地方轶事的架构中讨论，不免掩盖了其独特价值。

薛涛之独特，在于她在士大夫传统内完成了性别书写突围。她主动借用士大夫文学中标志性的自然意象、公共题材、酬唱文体，同时以女性生命体验重新诠释意象内涵、拓展书写边界、建构文化空间。其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竹意象、以浣花溪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书写、边塞与时政题材的介入、以及形制独特的薛涛笺，看似是个体创作与工艺实践，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策略：在男性主导的士大夫文化秩序中，以贴合传统的方式争取女性主体的表达空间。

中唐蜀地特殊的政治文化格局、幕府文人聚集的环境、浣花溪的隐逸书写共同塑造了薛涛的创作的文化背景。薛涛居于浣花溪，既延续此地的文人书写传统，又将浣花溪从士大夫隐逸空间，转化为女性生存、生产、社交、创作的独立空间。她以竹自喻，既接续士大夫“比德”传统，又注入身世之感与性别境遇；她创作边塞、时政、讽喻等相关作品，进入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公共书

写领域；她创制薛涛笺，借书写媒介的创新融入士大夫酬唱文化，实现身份突围。

本论文以薛涛诗歌及薛涛笺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文献互证、数据统计等方法。考察薛涛如何在中唐士大夫传统框架内，通过地理空间的意涵重构、核心意象的性别转化、书写媒介的创新突破完成性别书写。论文旨在论证：薛涛的女性书写并非脱离传统的激进反叛，而是传统之内的突围。她在依托中唐士大夫传统文化秩序的前提下，以女性视角拓展书写空间，从而在男性文人主导的文坛确立自身位置与价值。通过对薛涛创作与实践的研究，试图为古代女性性别书写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个例。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回顾

20 世纪的薛涛研究逐步从零散的点评批注和即兴鉴赏向系统化学术探讨转型，其历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 20 世纪上半叶（1912 年 - 1949 年）以生平考述与文学启蒙为特征，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学者开始将薛涛纳入文学史书写框架。¹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 年）首次为薛涛立专章，奠定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² 姜华〈介绍女诗人薛涛〉（1929 年）突破性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如温彻斯特、爱摩生的批评视角），既肯定薛涛“女中之英”的文学地位，又批判唐代女性压迫，成为早期中西比较研究的尝试。³ 傅润华编校

¹ 谢元鲁，〈20 世纪薛涛研究评述〉，《蜀学》2024 年第 23 辑，页 289-294。

²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16）。

³ 姜华，〈介绍女诗人薛涛〉，《真美善》1929 年第 3 期。

《薛涛诗》（1931 年）对薛涛身世与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评述。《薛涛年谱》尤具开创性学术价值，后世薛涛研究者广泛征引。⁴此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薛涛生平轮廓的勾勒与鉴赏式评价，尚未形成深度研究。后半期 20 世纪下半叶（1950 - 2000 年）的研究趋向文献考辨与学术专业化，以张篷舟、羊村、朱德慈等学者为代表，展开对生平、文本、交游等深度研究。张篷舟《薛涛诗笺》（1981 年）辑录 91 首诗作并详加校释，成为当时最完备的文本辑本⁵，其中《薛涛生卒究何年》（1982 年）考订薛涛生卒为 770 - 832 年，引发学界持续讨论。⁶羊村《女诗人薛涛》（1989 年）则提出颠覆性观点，否定薛涛乐妓身份及元薛情缘，认为其曾嫁资州刺史郑纲，虽引发争议，却推动研究突破传统框架。⁷1990 年成都薛涛研究会成立，薛涛研究从个体探索走向学术团体共同研究。

21 世纪薛涛研究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多维度拓展趋势：既有议题的再审视，又有新研究视角的引入，以及触及比较文学与接受史。⁸迟乃鹏（2004 年）提出“宾妓”概念，强调薛涛“以文谋生”的职业特征与相对自主的社会属性，修正对传统乐妓的认知，为理解薛涛在唐代社会中的独特地位提供新视角。黄芸珠（2003 年）以女性主义理论剖析薛诗的“男性化”风格，指

⁴ [唐]薛涛著、傅润华编校，《薛涛诗》（上海：光华书局，1931）。

⁵ [唐]薛涛著、张篷舟笺，《薛涛诗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⁶ 张篷舟，〈薛涛生卒究何年〉，《读书》1982 年第 9 期，页 152-154。

⁷ 羊村，《女诗人薛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⁸ 张阳，〈新世纪以来唐代女诗人薛涛研究综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4 卷第 3 期，页 106-108。

出其通过“高洁品格认同”“社会现实关注”突破性别壁垒。⁹与古代“男子作闺音”相呼应。韩国学者禹尚烈（2008 年）对比薛涛与朝鲜才女黄真伊，揭示东亚文化圈中女性诗人的共性与差异。¹⁰ 纵观薛涛研究史，薛涛研究经历了从“才女轶事考究”到“文化现象研究”的转变。20 世纪奠定文献基础与核心议题，21 世纪则以理论创新拓展研究边界。尽管如身份归属、文本真伪等争议犹存，但研究的深化已使薛涛不再是文学史上的边缘人物。

上述文献为薛涛研究的整体学术脉络。落实到本文所关注的薛涛性别书写与地域文化实践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文献：

傅润华编校《薛涛诗》较早对薛涛生卒及诗歌进行考辩。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辩〉结合韦皋任职时间、诗歌内证与交往逻辑重新考订生年。¹¹

在薛涛的身份定位与唐代女性生存的制度背景研究方面，高世瑜《唐代妇女》系统梳理了唐代官妓制度的律法规定、身份限制与生存状态，为本文界定薛涛的身份困境与时代局限提供了历史依据。¹²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则通过薛涛与李冶、鱼玄机的横向对比，指出薛涛是唐代三大女诗人中唯一系统性涉足边塞、时政等题材的创作者。¹³

⁹ 黄芸珠，〈略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页 67-70。

¹⁰ 禹尚烈，〈薛涛与黄真伊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页 97-100。

¹¹ 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辩〉，《社会科学研究》1992 年第 6 期，页 112-115。

¹² 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页 66。

¹³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喀什：喀什大学硕士论文，2021）。

在诗歌文本具体分析方面，黄芸珠〈略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何苇〈试论薛涛诗作中植物意象的审美意蕴〉¹⁴、卢丙华〈薛涛诗中的竹文化及其英译〉¹⁵、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¹⁶、田文娟〈薛涛诗中的女性身份认同〉¹⁷等文献，主要用于薛涛诗歌文本的基础解读，分析其诗歌意象、题材、风格的整体特征，探讨唐代女性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与身份表达相关问题，为本文的文本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参照。

在地域文化与幕府交游相关研究中，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¹⁸、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本）》¹⁹、周维扬〈杜甫与成都草堂〉²⁰、吴怀东〈“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论杜甫草堂诗生活与环境景物描写及其思想史意义〉²¹等文献，主要用于考察中唐西川幕府的文学生态，梳理薛涛与蜀地士大夫群体的交往脉络，厘清浣花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与文学意涵，为本文的地域文化实践研究提供背景支撑。

¹⁴ 何苇，〈试论薛涛诗作中植物意象的审美意蕴〉，《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27卷第3期，页88-89。

¹⁵ 卢丙华，〈薛涛诗中的竹文化及其英译〉，《海燕》2025年第1期，页110-113。

¹⁶ 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4）。

¹⁷ 田文娟，〈薛涛诗中的女性身份认同〉，《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14期，页68-69。

¹⁸ 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立德学报》2006年第3卷第2期，页101-120。

¹⁹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²⁰ 周维扬，〈杜甫与成都草堂〉，《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页34-37。

²¹ 吴怀东，〈“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论杜甫草堂诗生活与环境景物描写及其思想史意义〉，《学术交流》2024年第1期，页175-192。

在薛涛笺与相关研究中，张正则等《女诗人薛涛与望江楼公园》²²、林宇娇〈中晚唐时期成都地区的笺纸工艺发展研究——以薛涛笺为例〉²³、王珊《以薛涛笺为中心的早期笔纸制作工艺研究》²⁴、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²⁵等文献，主要用于考证薛涛笺的工艺特征、形制流变与传播路径，梳理中唐诗歌酬唱传统的发展脉络与社交属性，为薛涛笺的文化价值研究提供史料与理论依据。

上述文献共同构成本文研究的文献基础，为全文的论证提供了全面的史料、文本与理论参照。

第三节 论文构思与研究方法

本论文整体结构分为五章，依照章节次序推进论证逻辑：

第一章为绪言，说明研究动机、回顾前人研究历史、阐明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预测研究难点与研究成果。

第二章概述薛涛生平与中唐文化背景。并界定“中唐士大夫传统”内涵。

第三章集中讨论薛涛诗歌意象上的突围与性别书写。分别从浣花溪地理空间意涵、竹意象的双重象征、诗歌语言与题材边界突破三方面展开文本分析。

²² 张正则等编著，《女诗人薛涛与望江楼公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²³ 林宇娇，〈中晚唐时期成都地区的笺纸工艺发展研究——以薛涛笺为例〉，《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页6-7。

²⁴ 王珊，《以薛涛笺为中心的早期笔纸制作工艺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论文，2019）。

²⁵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论文，2004）。

第四章论述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的密切关联。依次讨论蜀地士大夫文化、元白诗派的影响、薛涛笺的文化功能，最终聚焦于薛涛性别书写系传统之内的突围。

第五章为结语，总结全文观点，提炼薛涛性别书写的价值与局限。

并综合运用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文献互证法。利用《薛涛诗笺（修订版）》《全唐诗》《唐才子传校笺》《新唐书》及四川地方志等史料，梳理薛涛生平、交游、创作背景与中唐文化制度。

第二，数据统计法。对薛涛现存的 93 首诗歌进行分类统计，包括浣花溪相关诗作统计、竹意象出现频次统计、诗歌主题分类统计，以数据支撑论点。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成果预计

唐代女性文献存世较少，论文研究面临着史料不足的困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依赖二手文献间接佐证。在文献辨析时，薛涛的生平事迹仅零散地存在于文人笔记或地方县志之中且互有矛盾，因此在研究时要秉持谨慎态度进行考证。针对薛涛的研究，在论证逻辑上需注重兼顾士大夫传统意象运用与个体独特表达特色的平衡，防止陷入对性别特征的绝对化解读。此外，对薛涛性别书写的突围边界较难把握，避免极端化分析。

本文预期达成三方面成果：

第一，揭示薛涛性别书写的特征：她以士大夫意象为外壳，以女性境遇为内核，在传统内部完成突围，而非脱离传统。

第二，阐明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密切联系：薛涛借助士大夫传统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同时以女性视角丰富并拓展士大夫书写传统的边界。

第三，深化对浣花溪空间、竹意象、薛涛笺的整体理解，说明三者如何共同构成薛涛的性别书写与文化实践。

第二章 薛涛生平与中唐文化背景概述

第一节 薛涛生平概述

薛涛生活于中唐乱世与文化转型期，虽为官妓，却凭借诗才突破乐籍限制，成为唐代唯一被《全唐诗》单独列卷的女性诗人；不仅通晓音律、工于书法，更以制笺技艺名垂工艺史。

其生平虽未见于正史，却在地方志与文人笔记中留下碎片痕迹。薛涛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唐末范摅的《云溪友议》，但记载并不详备。后有，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元费着《笺纸语》等均有介绍，然而这些记载太过简略，且有矛盾之处。其中，元代费着的《笺纸谱》关于薛涛生平的记载相对完整，成为后世研究薛涛的依据。²⁶

《笺纸谱》原书已散佚，明代陶宗仪《说郛》（宛委山堂本）收录节本，清代《全蜀艺文志》、《四川通志》也有转录。现存地方志中，清代张晋生等撰的《乾隆四川通志》与常明修等撰的《嘉庆四川通志》记录较为完善。

薛涛（781年—832年），字洪度（又作宏度），生于长安，幼年随父薛郾迁居蜀地（今四川）。父亲去世后，母亲守寡，薛涛因诗名在外，开始与各地名士交往，在酒宴上赋诗应酬，出入于官员幕府。²⁷贞元元年（785年）入乐籍，

²⁶ 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页3。

²⁷ [清]张晋生等，《乾隆四川通志》（识典古籍，访问于2026年2月24日），卷46，页71，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HY4587/chapter/1kt98oid5e9fj?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28¶graphId=7536830762570825778&lineId=2889&sentenceId=7579269125396070454。

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官妓。得与历任节度使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等交游，更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中唐名士诗文唱和。晚年脱籍隐居浣花溪，创制松花小笺，世称“薛涛笺”。大和六年（832年）卒，葬于成都锦江南岸即今望江楼公园。

目前学界对薛涛卒年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薛涛卒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但在薛涛生年和享年存在较大分歧。傅润华《薛涛诗·薛涛年谱》以卒年大和六年为基准,倒推享年六十四岁之说,将生年定为大历三年(768年)。²⁸张篷舟《薛涛诗笺》考订生年为大历五年(770年),享年63岁,但其结论因《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等诗的存在矛盾遭到质疑——刘天文指出,韦皋获授相衔时间与诗题称“相公”的史实矛盾,且薛涛作品中自称“儿”的口吻与38岁年龄存在语境冲突。²⁹基于上述矛盾,刘天文结合韦皋官职的时间考辨、薛涛与元稹交往年龄合理性、寿命规律及诗作本身语境推断薛涛生于建中二年(781年)。³⁰虽说刘天文观点中仍有论点存疑,但其结论更加契合诗歌佐证与逻辑推演,故本文主张以781—832为薛涛的生卒年。

²⁸ [唐]薛涛著、傅润华编校,《薛涛诗》,页62。

²⁹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页159-163。本文所用薛涛诗歌文本均出自该书。

³⁰ 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辨》,页113-115。

第二节 中唐文化背景概述

薛涛一生历经代宗（762 年）至文宗（840 年）八朝，正是安史之乱后百业凋零、藩镇割据、科举制度成熟、文人阶层崛起多重背景跌宕之际。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出世俗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质是盛唐气象消逝后，士人在社会创伤与政治震荡中寻求精神出路的艺术折射。³¹诗歌创作逐渐从宏阔的集体叙事 转向细腻 的个体抒情。白居易倡导的新体乐府与韩愈推动的文风革新等活动，促进了文学表达形式的拓展。此阶段存世诗作总量中，女性作者的作品较前代显着增加，以薛涛、李季兰、鱼玄机“唐代三大女诗人”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体涌现，形成特定历史时期下文学发展的特有现象。

安史之乱后，盛唐恢宏的集体叙事逐渐消解，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士大夫，在震荡中完成了文学传统与精神内核的重建，形成了本文所聚焦的“中唐士大夫传统”。这一传统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文学风气，也是薛涛创作与文化实践所处的背景，可从三大层面论之：

第一，以比兴意象喻君子品格的咏物言志传统。中唐士大夫延续并深化了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将竹、松等自然意象进一步发展为君子高洁、自持、不屈品格的文化符号，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比德”书写范式³²，是这一时期文人自我品格标榜与精神表达的载体。

³¹ 许总，《唐诗史》（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页 7-8。

³² 即中唐文人以自然物象比拟君子品德的创作模式。

第二，以文会友、以诗酬唱的社交文化传统。随着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幕府文化的兴盛，诗歌唱和成为中唐文人士大夫社交往来、身份认同、文坛话语权构建的方式，与之配套的笺纸、文房雅物也成为文人圈层社交的重要媒介。

第三，兼济天下、关注现实的入世精神传统。中唐士大夫始终以儒家入世思想为核心，即便身处贬谪、避乱的人生低谷，仍保持着对时局、民生、家国的关注，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体系，在元白诗派中集中体现为重现实、重讽喻的创作取向。³³

这一由男性文人群体主导构建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唐文学创作的核心语境，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审美评价与价值体系。而薛涛以乐籍女性的身份跻身这一主流文人圈层，其诗歌创作、笺纸工艺与地域文化实践，本质上都是在这一传统框架内，完成的性别突围与主体性表达。

根据唐代律法，贫家女嫁人有诸多限制，薛涛幼年丧父、母亲寡居，且无族人可帮衬。恰又有诗名在外，极其容易成为达官显贵们的消遣。在社会限制和自身困境的压力下，薛涛只能选择官妓作为职业。³⁴在唐代，官妓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生存状态深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官妓身份卑贱且无人身自由，依唐律，良人伤害贱民无重罪，这使得她们沦为供人取乐玩弄的对象。³⁵

虽然乐妓大多具备一定技艺，或擅长歌舞，或精通诗文等，但其文艺活动常被视作职业附属行为，而非独立的创作活动。她们的创作往往难以获得严肃文学的认可。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对这类女性创作者的评价标准也充满矛盾，

³³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二卷，页278-285。

³⁴ 景伟，《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页16。

³⁵ 高世瑜，《唐代妇女》，页66。

她们既被期待展现文采风流，又受传统伦理观念的约束。如胡震亨称薛涛的诗“无雌声”，钟惺赞其“有丈夫气”，此类评语始终以男性创作的审美标准评判女性书写，将“去女性化”作为对薛涛诗歌的褒奖，本质上仍是以男性中心的评价体系框定女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薛涛在传统框架内完成性别突围的主体性表达。

第三章 薛涛诗歌的意象突围与性别书写新变

第一节 地理空间与书写载体：浣花溪的文化意涵与薛涛笺创制

据张篷舟《薛涛诗笺（修订版）》校订逐篇统计，薛涛现存 93 首可考诗作中，诗题或诗句明确提及“锦浦”“浣花亭”等浣花溪沿岸地标、或经笺注可确认描写浣花溪实景的作品共 6 首，计入“碧溪”等间接指涉浣花溪的篇目，相关作品共计 7 首，且全部集中创作于她脱籍退隐浣花溪之后。³⁶可见，浣花溪并非薛涛诗歌中随机出现的写景背景，而是其脱离乐籍、完成身份转换后实现性别书写突围的主要地域。薛涛笔下的浣花溪意涵与同样在此地寓居的杜甫有着不同象征意义，这正是她在士人传统框架内空间书写突围的具体尝试。

浣花溪位于成都县西南，其地理位置与名称由来在历代方志中有明确记录。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

“浣花溪在县东南五里，《方輿胜览》一名百花潭。……杜子美尝居此。

又女校书薛涛，以潭水造笺为十色。”³⁷

《大明一统名胜志》亦载：

“浣花溪……按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云：夫人微时，见一僧坠污

渠，为濯其衣，顷刻百花满潭，因名曰百花。按蜀志补遗：浣花溪有石刻

³⁶ 本段统计根据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中所收录薛涛诗作整理而得，详细请见附录表 1 薛涛诗中浣花溪地理空间相关诗作统计表。

³⁷ [清]常明等，《嘉庆四川通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卷 10，页 9，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7482039257507299347/chapter/1lgzbmo8c9xye?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4&refreshId=1776844021031

浣花夫人像，夫人姓任氏，崔宁之妾也。通鉴：成都节度使崔旰入朝，杨子琳乘虚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财募兵，得数千人，自帅以击之，子琳败走。朝廷加旰尚书，赐名宁，任氏封夫人。”³⁸

浣花溪原名百花潭，其名称的演变与唐代一位传奇女性相关。相传因一位女性曾在溪边为僧人浣洗袈裟，顷刻间百花满潭，故得名百花潭。这位女性便是后来的“浣花夫人”任氏，她乃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妾。当杨子琳乘虚进攻成都时，任氏散尽家财招募兵勇，亲自率军击退来犯之敌，因战功被封为冀国夫人。这一传说展现出浣花溪女性书写的文化底色，为后世薛涛在此地的创作与实践埋下伏笔。

浣花溪地理位置既临近成都城郭，便于与文人官员往来酬唱，又稍离市井喧嚣，保有山水之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理想环境。且浣花溪一带以制笺业闻名，《光绪华阳县志》中引《笺纸谱》云：“以纸为业者家其旁，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盖亦水之宜矣。”³⁹成熟的造纸工艺传统，为薛涛后来改良笺纸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薛涛的浣花溪相关诗作中以《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一诗为代表，虽全篇未直接描写浣花溪景色，但以“浣花亭”为题，表明此地已成

³⁸ [明] 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四川名胜志卷 2，页 7，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HY0113/chapter/1kbmj78f80i79?paragraphId=7413321643818418227&page_from=reading_midpage

³⁹ [清] 吴巩等，《光绪华阳县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9 日），卷 6，页 10，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7501694217039642678/chapter/1lhqeldbtrls6?paragraphId=7567273541562220550&page_from=reading_midpage

为与士大夫酬唱的日常空间。这类将地理空间纳入诗歌题咏的书写方式，使浣花溪从单纯的生活场所升华为文学意象。

提及浣花溪的书写，不可绕过另一位在此寓居的诗人——杜甫。安史之乱导致关辅饥荒，杜甫被迫弃官入蜀。《新唐书》记载：

“（杜甫）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⁴⁰

杜甫在此居住期间累计创作相关诗作 240 余首⁴¹。〈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一诗中“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明确其居住的“草堂”正位于浣花溪畔。⁴²

杜甫笔下的浣花溪，是其远离官场动荡后的栖居空间。在这里，他既遵循儒家“无道则隐”的古训而抽身政治，又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实现了避尘嚣、近自然的隐逸化书写。⁴³浣花溪由此成为士大夫远离朝堂、避世修身的精神隐逸象征。薛涛笔下的浣花溪，则跳出了隐逸空间的单一属性，有着三重不同的内涵：一是她脱离乐籍后安稳度日的日常生活空间；二是她创造薛涛笺的生产场所；三是她与官员、文人往来酬唱的社交领域。二者对同一地域空间书写的根本差异在于：杜甫笔下的浣花溪是传统士大夫的退居与归隐之所，而薛涛笔下的浣花溪则是女性创作者的个人叙事表达空间。这正是薛涛性别书写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显著变化，也是她诗歌意象突围的体现之一。使得浣花溪从文人栖居象征转化为女性创作与实践的象征，生出了更丰富的性别书写内涵。

⁴⁰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 201，页 5737。

⁴¹ 周维扬，〈杜甫与成都草堂〉，页 37。

⁴² [唐]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卷 12，页 3461。

⁴³ 吴怀东，〈“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论杜甫草堂诗生活与环境景物描写及其思想史意义〉，页 182-185。

薛涛对浣花溪文化意涵的阐释不仅体现在诗歌文本的书写层面，更延伸至书写载体的物质层面创新。她在浣花溪创制的“薛涛笺”同样是她参与士大夫文化活动的重要体现。薛涛创制的诗笺因其人而得名“薛涛笺”，又因她“女校书”的身份而被时人称为“校书笺”。也有人以产地命名为“浣花笺”或“蜀笺”，不过这并非专指薛涛笺，由于汉唐以来，四川造纸业久负盛名，成都造纸工坊多集中于浣花溪畔。还有人因其色彩称其为“红笺”，但这也非薛涛笺专属，早在东晋简文帝时期便有“红笺”之名。至于“松花笺”，则是后人误称，早在薛涛笺前就有以此为名的笺纸。⁴⁴

薛涛笺是小幅诗笺，主要用于书写短诗，其制作突破体现在原料与形制两方面。原料上，采用芙蓉树皮替代传统麻料，以胭脂花染色取代官府规定的黄檗染色。⁴⁵形制上，专为短诗创作设计的小幅窄笺，适配了她在浣花溪畔的日常书写需求。由于染料不固色，所染之色也不稳定，故而薛涛笺的颜色并非单一一种。早期为松花绿色，中后期为红色，也会小概率出现一些红绿相间的情况。⁴⁶薛涛制作的“薛涛笺”，以其独特的工艺和审美，受到当时文人的喜爱，这为薛涛融入士大夫圈层创造了一定条件。

浣花溪为薛涛提供了创作与生活的土壤，她通过诗歌作品和诗笺创新也赋予这片土地新的文化内涵。薛涛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也使浣花溪因她的活动而被赋予更多文化色彩。

⁴⁴ 张正则等编著，《女诗人薛涛与望江楼公园》，页26。

⁴⁵ 林宇娇，〈中晚唐时期成都地区的笺纸工艺发展研究——以薛涛笺为例〉，页7。

⁴⁶ 王珊，《以薛涛笺为中心的早期笔纸制作工艺研究》，页24。

第二节 “竹”意象的双重象征：士人风骨与个体困境

经逐篇检索统计，《薛涛诗笺（修订版）》收录的 93 首作品中，“竹”意象共出现 10 次，是其使用频次最高的自然意象之一；⁴⁷而作为中唐士大夫咏竹传统的代表，白居易存世诗歌中“竹”意象出现频次达 235 次，形成了成熟的以竹比德的抒情手法。薛涛的竹意象书写在这一成熟的士大夫传统下，实现性别书写的突破。其笔下的“竹”兼具士人风骨与个体困境的双重象征，即接续了士大夫的比德传统，又饱含个人际遇，形成独特审美意蕴。

如《酬人雨后玩竹》：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⁴⁸

诗中对竹子高风亮节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赞扬，一是赞赏即使在春雨的温润浸润中竹子依旧坚韧，在不同境遇中坚守自我的品质；二是虚心自持、不骄不躁的特性；三是诗人认为到了晚年再去欣赏竹子，依然能看到它刚劲的气节，令人钦佩。⁴⁹其中化用竹林七贤典故，呼应士人雅集的超逸风骨，又暗喻娥皇女英泣竹成斑之典故。既凸显薛涛追慕魏晋风流的士人风骨，亦透出对自身身世飘零的隐喻——薛涛早年沦落乐籍，虽才华卓绝，却难逃世俗桎梏。同时以竹子自喻，借竹子的品质来表达自己的坚守与志向。这种身世飘零的隐喻与高洁自持的坚守，与她脱离乐籍后定居浣花溪寻求精神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生状态高度契

⁴⁷ 依据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所收薛涛诗作逐句检索统计而得。详细请见附录表 2 薛涛诗中“竹”意象出现频次统计表。

⁴⁸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页 1。

⁴⁹ 卢丙华，〈薛涛诗中的竹文化及其英译〉，页 111。

合。《酬人雨后玩竹》的开篇便化用了士人咏竹的经典模式，“虚心能自持”“苍苍劲节奇”接续了自魏晋以来士大夫文人以竹比喻君子高洁不屈的比德传统。这便是薛涛参与士大夫书写传统的具体体现，但与士人咏竹诗不同的是，她在诗中融入了属于女性的生命困境。

白居易作为中唐士大夫文咏竹传统的代表人物，其对竹的书写代表了中唐主流士人阶层对这一意象的经典诠释方式。《池上竹下作》

“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食饱窗间新睡后，脚轻林下独行时。

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⁵⁰中“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将竹定义为士大夫淡泊自守处世哲学的象征，是功成身退后主动选择的人生态度。此诗是传统士大夫的对淡泊名利、谦虚和逊的处世哲学赞赏与推崇的哲学化表达。薛涛则跳出了纯粹的哲学隐喻，多了一层借竹抒写个体境遇：竹之“劲节”既象征士人坚守气节的精神，亦暗喻其身处名利场而自持高洁的孤傲⁵¹。其中透露出的些许“悲凉”正是薛涛对命运无常的体悟，这样的书写方式并非刻意提及，而是基于独特际遇的自然流露。薛涛才情与际遇的矛盾，使得传统士大夫意象在个体情感的折射中有了新的解读。

二者同属于君子比德的咏物传统，却因身份与生命体现的差异，生发出截然不同的内涵。薛涛没有颠覆士大夫以竹比德的传统创作风格，而是在传统框架内注入了自我生命体悟与主体意识。薛涛的这种表达方式具有独特性与偶然性。独特性在于，在男性诗人占主流的唐代诗坛，她作为女性诗人，以竹为载

⁵⁰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23，页1854。

⁵¹ 何苇，〈试论薛涛诗作中植物意象的审美意蕴〉，页89。

体书写品格与情感，既不同于男性文人对竹的哲学化书写，也未局限于传统女性诗歌的哀怨情思。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偶然性则由于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以及凭借才华跻身文人群体的特殊经历，使其得以跨越性别的审美特质，打破了性别的刻板标签。在薛涛的诗歌创作中，“竹”意象从士大夫品格象征符号转变为女性自我言说的书写工具。正如学者何苇所言，“在男性诗人占主流的背景之下，薛涛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卓绝的才华成为活跃在蜀地诗坛的一位不可不提的女诗人。”⁵²

薛涛在浣花溪畔的生活，让她对竹有了最真切的观察与感受。她写竹，既沿用了文人以竹比君子、赞高洁的一贯写法，又把自己半生的身世浮沉、身处困境却始终自持的心境都写了进去，让原本用于彰显士人风骨的意象成为了女性自我言说、自我坚守的表达方式，这正是其在中唐士大夫传统下性别书写突围的又一体现。

第三节 题材突破与语言突破：薛涛诗歌语言的性别书写新变

薛涛对性别书写边界的突破，还体现在诗歌文本的语言与题材层面，她跳出了传统女性创作的闺阁局限，进入了原本由士大夫为中心的题材领域。

在题材与语言选择上，薛涛打破了传统女性书写的边界。唐代女性诗歌多集中于闺怨、爱情等私人化题材，意象多局限于“镜”“帘”“灯”等闺阁物象，而薛涛则主动选用“竹”“松”“边城”“烽烟”等原本属于士大夫创作

⁵² 何苇，〈试论薛涛诗作中植物意象的审美意蕴〉，页 88。

的经典意象，进入了传统女性极少涉足的边塞、讽喻等公共题材领域。看其《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

其一：“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其二：“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⁵³

运用了“边城苦”“陇头儿”“烽烟”等典型的边塞诗意象，而“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书写了对戍边士兵的同情，跳出了闺阁诗的抒情模式，弱化了女性身份标签，呈现出与主流士大夫边塞诗同样的雄浑视野。这在唐代女性诗人中较为少见，凸显了薛涛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再看其《筹边楼》：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⁵⁴

以“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展现雄浑气象。颇有见地地告诫边疆将领“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其胸襟和胆识令人佩服。⁵⁵直接以士大夫视角讽喻边将失策、关注西川边防，跳出了传统女性创作的视角。相较于同时期的李冶、鱼玄机等女诗人，薛涛的性别边界突破尤为显著，跳出了女性闺阁局限。⁵⁶

除了边塞与讽喻题材的突破，薛涛在酬唱诗上同样打破了传统女性创作的边界。中唐时期，诗歌酬唱是士大夫群体主要文学交流方式，而同时代女性诗人的酬唱诗作多局限于闺阁密友间的赠答、与伴侣间的情爱抒怀，极少以平等的文人身份，参与到关乎地方治理、家国时局的官方酬唱之中。薛涛现存的诗

⁵³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页10。

⁵⁴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页70。

⁵⁵ 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页194。

⁵⁶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页49。

作中，酬赠唱和类作品达 53 首，占比过半数，其中大量篇目是写给西川节度使、幕府僚佐或入朝官员的酬唱，跳出了传统女性酬唱着眼于个人领域的局限。⁵⁷如

《贼平后上高相公》：

“惊看天地白荒荒，瞥见青山旧夕阳。

始信大威能照映，由来日月借生光。”⁵⁸

这首诗作于元和元年（806 年）高崇文平定西川刘辟叛乱之后，是薛涛写给平叛主帅高崇文的酬赠诗。全诗没有谄媚逢迎，也没有闺阁化的私人抒情，而是用全景视角描写战乱后西川的景象。⁵⁹首联以“天地白荒荒”描绘战乱后西川的民生疮痍，“青山旧夕阳”借“青山”与“夕阳”对照战乱后山河依旧、秩序待复。尾联“始信大威能照映，由来日月借生光”的颂赞，绝非乐妓对权贵的讨好逢迎，是对高崇文平叛功绩的正面肯定。刘辟之乱是中唐前期规模较大的藩镇叛乱之一，高崇文平定西川，是唐王朝重建中央权威的重要节点。⁶⁰薛涛诗中表达的态度，与元稹、白居易等中唐士大夫对平叛一事的赞许并无二致。再如《上川主武元衡相国二首》：

“其一：

落日重城夕雾收，玳筵雕俎荐诸侯。

因令朗月当庭燎，不使珠帘下玉钩。

⁵⁷ 依据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所收薛涛诗作逐句检索统计而得。详细请见附录表 3 薛涛存世诗歌主题分类统计表。

⁵⁸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页 19。

⁵⁹ 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页 108。

⁶⁰ 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页 108-109。

其二：

东阁移尊绮席陈，貂簪龙节更宜春。

军城画角三声歇，云幕初垂红烛新。”⁶¹

这是薛涛写给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的酬唱诗，两首诗写武元衡在蜀地春夜设宴的场面，实则借宴饮之乐称赞武元衡治蜀的政绩。⁶²唐代女性写宴饮场景，多以陪侍乐妓、闺中女子的身份，书写歌舞之乐、情爱之思或自伤身世的哀怨，始终是宴饮场景中的被观赏者；而薛涛在这两首诗中，跳出了“陪宴乐妓”的视角与眼界，以平等的文人视角进行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薛涛的这类创作并非单纯模仿男性士大夫的雄浑风格，更不是以“无雌声”迎合男性审美，而是在接续士大夫“兼济天下”入世精神的中唐士大夫传统文化内融入了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如《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其一》中“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展现军事视角，但尾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通过“门下曲”与“陇头儿”的对比，委婉地把将帅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士兵们的艰辛进行比较，讥讽将帅奢糜的生活的同时表达对士兵们的同情。⁶³既以士大夫的视角关注边塞疾苦，又以女性的共情力写出底层士兵的艰辛，更以被罚之身的边缘视角对边塞现实做出了不同的独特表达。这正是薛涛的性别书写在诗歌语言与题材边界上有所突破的表现。

⁶¹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页28。

⁶² 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页110。

⁶³ 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页194。

第四章 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

以元稹、白居易等为核心的中唐传统士大夫，构成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力量，其诗文趣味与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唐的文学风气，比德咏物、以诗酬唱、兼济天下是其核心内涵。纵观薛涛的创作与实践，她并非这一以男性文人为中心的传统的被动迎合者，也不全然是脱离传统的反叛者，而是从地理空间意涵构建、意象性别书写、文化媒介创新这三重方式与中唐士大夫往来交互。既借由士大夫传统获得了进入主流文坛的资本，又以独有的女性生命体验对传统文人书写的性别化突破。

第一节 薛涛与蜀地士大夫文化传统

前文第三章对薛涛性别书写中的地理空间意涵做了具体分析。本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书写与蜀地士大夫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动荡而蜀地相对安宁，吸引了部分文人南迁。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将成都设为陪都，授予京号“南京”，并且升蜀郡为成都府。⁶⁴同年，朝廷又分置剑南西川节度使与剑南东川节度使。⁶⁵这一系列制度调整使蜀地的政治规格与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提升，逐渐成为除两京之外文人集中、创作活跃的文化重地。杜甫、高适、岑参、元稹等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人均有入蜀的经历，白居易亦曾宦游巴蜀（忠州）。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从而逐

⁶⁴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2，页1079。

⁶⁵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67，页1870。

渐成为士大夫文人聚集与交游的中心，而剑南西川节度使作为当时在西南最高军政长官，通常由朝廷重臣、文坛名流或德才兼备者出任。在唐代方镇体制下，入幕本身就是文人仕进的一条常见出路，西川幕府因所处位置与政治分量特殊，既处理军政事务，也为蜀中士人提供了日常往来以及诗酒唱和的空间。⁶⁶ 正因幕府中并不严格计较出身与身份，而更在意诗才与文采，薛涛以乐籍女子的身份进入蜀地的主流文人士大夫圈层才有了现实的可能。

蜀地士大夫群体对薛涛的接纳与认可最初始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赏识和礼遇。贞元元年（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镇守蜀地长达二十一年。他出身京兆韦氏，既有显赫战功，又颇重文辞诗赋。⁶⁷ 据《唐才子传》记载，韦皋镇蜀期间召薛涛入幕府“侍酒赋诗”，薛涛便凭借出色的诗才获得赏识。⁶⁸ 韦皋曾“以校书郎奏请”朝廷之议，但因“护军不可而止”未能施行，但薛涛“女校书”的名号就此流传。⁶⁹ 韦皋的提拔与礼遇让薛涛在蜀地士大夫间逐渐积累了声望，为日后“女校书”名号真正确立奠定了基础。

继韦皋之后，出镇西川的中唐宰相诗人武元衡同样对薛涛的诗才极为欣赏，真正使“校书”之名获得奏请的便是他。⁷⁰ 这从官方层面认可了薛涛的文人身份，

⁶⁶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本）》，页80-84。

⁶⁷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58，页4934-4936。

⁶⁸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6，页104。

⁶⁹ [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6，页106。

⁷⁰ 关于奏请校书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①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及元费著《笺纸谱》认为韦皋镇蜀时欲奏而罢，薛涛“校书”名号自此始。②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明言“武元衡奏校书郎”。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作于元和初年，适值武元衡镇蜀时期，诗中已有“女校书”之语，这为武元衡奏请说提供了时间上的有力佐证。③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疑“奏授”之事“恐无是理”，推测为幕府间“褒借为戏”的虚誉。综合各说及薛涛生平考辨，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韦皋时期薛涛已因诗才受到异乎寻常的礼遇，幕僚间或已有“校书”戏

成为她区别于普通乐妓的身份标签，得以摆脱传统乐妓多“以色事人”的印象，获得了与士大夫群体平等对话的机会，进而抒发自己的生命体悟与自我表达。

蜀地的特殊地位以及幕府的开放风气使薛涛以乐籍身份进入士大夫交往圈层成为可能，韦皋与武元衡相继赏识与礼遇则从官方层面确认了其文人身份。成都即是薛涛的居所，也是她参与士大夫酬唱的场所。从至德二载成都设府、分置剑南东西两川所带来的文士聚集，到西川幕府重才不重出身的交往风气，再到“女校书”名号的奏请与认可，这几重因素共同促成薛涛进入中唐士大夫文化圈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薛涛的诗歌得以传播。

第二节 薛涛与元白诗派

前文第三章已系统分析了薛涛在竹意象、边塞题材上的性别新变，本节将进一步论证这些新变本质上是薛涛与以元白诗派为代表的中唐主流士大夫传统的互文对话。

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是中唐元和年间文坛的主流，也是中唐士大夫传统的代表性人物。其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⁷¹的创作理念及重酬唱、写实的创作风格，是中唐主流文坛的创作标准。元稹曾以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与薛涛有直接交往唱和；白居易虽无直接往来，但作为元白

称；至武元衡镇蜀时，才有正式奏请之举，虽未获实授，但经奏请及王建等人题咏，“女校书”之名逐渐成为兼具幕府认可与士大夫共识的身份标识。

⁷¹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8，页321。

诗派领袖人物之一，其诗学理念通过往来酬唱也间接影响了蜀地文人。简言之，元稹与白居易二人是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的对话的纽带。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⁷²其间与薛涛相识，两人往来唱和频繁。元稹《寄赠薛涛》写道：

“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⁷³

将薛涛与汉代才女卓文君类比，并极赞其诗才与文采。称薛涛的言谈如鹦鹉般机巧善辩，文章更是珍贵如凤凰之毛，令无数文人雅士、公卿将相都自愧不如。可见元稹对薛涛的欣赏与推崇。这一评价出自中唐主流士大夫之口，意味着薛涛的文人身份获得了中唐主流文坛的承认与赞赏。在唐代文人唱和诗中，赠答诗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更是士人之间建立联系、确认身份、维系关系的一种交往方式。⁷⁴薛涛凭借诗才，得以突破地域与身份的限制加入其中，从而获得了与士大夫平等对话的资格与文人身份的认可。

若说与元稹的直接交往象征着薛涛的文人身份被中唐士大夫所认可，那么与白居易的间接交往则意味着薛涛对中唐士大夫传统既有所承接，又以女性视角和感悟做出了改写——“竹”意象的书写与边塞诗和酬唱诗的书写。前文第三章已通过对比论证了薛涛与白居易在竹意象书写上的本质差异，即白居易的

⁷²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74，页5227。

⁷³ [唐]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续补遗卷1，页1562。

⁷⁴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页24-25。

竹意象是士大夫群体制动选择的处世哲学，薛涛的竹意象则是是囿于身份困境中的女性对高洁品格的坚守与自喻，是被动境遇的突围。边塞诗与酬唱诗更是直接呼应了元白诗派的创作理念，聚焦点不再只是闺阁日常，而是西川边防与地方治理。以女性视角介入士大夫传统，写出自己的观察与判断。由此说明她的创作突破了传统女性书写的边界。

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是中唐士大夫文人传统的核心人物。薛涛与二人的互动，不仅证明其获得了中唐主流士大夫群体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以女性视角体验实现了性别突围。

第三节 薛涛笺在中唐士大夫传统中的价值

前文第三章说明了薛涛笺的形制改良以及与薛涛浣花溪空间书写的关系。本节将在此基础上，论证薛涛笺并非单纯的工艺创新，而是薛涛深度参与中唐士大夫文化活动、实现身份突围的媒介。

中唐时期，诗歌酬唱已成为士大夫维系社交的主要方式。此前以朝堂应制或宴会即兴的为主的宫廷唱和逐渐发展为以写实讽喻为主的私人唱和。⁷⁵笺纸不再是单纯的书写载体，而是文人审美品位与身份层级的象征，更是士大夫往来酬唱的主要媒介。⁷⁶薛涛笺之所以能流行与士大夫群体间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精准适配中唐士大夫群体需求。中唐时期士大夫的审美从盛唐时雄浑壮阔转向清雅与个人意趣，从中唐主流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就能瞥见一二。官方通用的白纸、

⁷⁵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页133-166。

⁷⁶ 王珊，《以薛涛笺为中心的早期笔纸制作工艺研究》，页178。

黄壁染纸等样式无法满足文人彰显个人品位的需求，虽在此前民间就已出现松色笺、十色笺等笺纸，但此时诗歌多为绝句、短律等篇幅短小的体制，上述笺纸纸张篇幅较大不便于使用。薛涛笺颜色多变、纹案精致且小幅窄笺的形制恰好契合短诗酬唱的书写与士大夫文人审美需求。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薛涛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也是它不同于一般工艺改良的地方。一方面，薛涛笺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参与了中唐文人酬唱风气的塑造。它最初只流行于蜀地幕府间的小众纸张，后随着西川幕府文人向外流传，逐步流传到江南士族，乃至后世流传。⁷⁷元稹、刘禹锡、李商隐等文人雅士都留有题咏或使用薛涛笺的诗作。如李商隐诗中“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⁷⁸的题咏；韦庄“一纸万金犹不惜”⁷⁹的赞叹。这说明薛涛笺在士大夫文人交往中倍受推崇，使用薛涛笺唱和逐渐成为中唐文人乃至后世文人的一种风气。

再一方面，薛涛也借由薛涛笺在各地的流通改变了自己在士大夫圈层中的位置。在此之前，薛涛更多是士大夫被酬唱的对象，而薛涛笺的流传给薛涛多赋予了一重身份，即文化用品的创造者与提供者。当文人雅士用薛涛创制的笺纸往来唱和时，这便意味着对她审美品位与趣味的认可。由此，薛涛不再只是西川幕府中文采翩然的乐妓，她的身份在中唐士大夫间被重新估量，逐步获得中唐主流文坛的认可。

⁷⁷ 林宇娇，〈中晚唐时期成都地区的笺纸工艺发展研究——以薛涛笺为例〉，页7。

⁷⁸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卷539，页6200-6201。

⁷⁹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卷700，页8120。

薛涛笺不是单纯的工艺改良，而是薛涛深度参与中唐士大夫文化活动的实践。它切合了当时士大夫酬唱的实际需要与审美趣味，成为文人交往中常用的物品，进而反过来影响了酬唱风气本身。同时，薛涛笺在各地的流通，也使薛涛在士大夫文化圈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以制笺者的身份参与到文人日常书写之中。元稹、白居易等人使用薛涛笺唱和，本身即是对她文人趣味的认可。从这个角度看，薛涛笺既进入了中唐士大夫传统的内部，也让薛涛获得了超出乐籍身份的评价，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第四节 薛涛性别书写之传统之内的突围

本章前三节分别从地理空间意涵塑造、意象性别书写、文化媒介创新三个维度论证薛涛与中唐士大夫传统的互动。本节在次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析，薛涛性别书写仍处于“传统之内的突围”。

薛涛的性别书写并没有完全颠覆中唐士大夫传统，而是传统之内的突围。她没有打破男性主导的文化秩序，也没有脱离中唐中唐文人主流的写作风气，而是在传统的框架之内找到了女性创作者自我表达的缝隙，通过微小缝隙撬出在士大夫传统中以男性为中心叙事氛围的一席之地。她主动沿用士大夫传统内涵，结合自身生命体验，注入新的性别意涵。借用士大夫的诗文路数转，写出女性视角下的体会与判断，传递女性经验，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⁸⁰这使得薛涛的创作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女性诗人，也区别于男性士大夫的创作。同时期的李冶有“女中诗豪”之誉，鱼玄机以才情闻世，但她们的创作活动与交游范围

⁸⁰ 田文娟，〈薛涛诗中的女性身份认同〉，页 69。

较小，多在个人社交圈层，很少涉及士大夫所关注的公共题材，薛涛则与之相反。⁸¹

薛涛性别书写的突围，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个人际遇交汇下偶然出现的，不具备普遍的可复制性。他的创作与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蜀地川西幕府的开放风气，也依赖于韦皋、武元衡、元稹等士大夫的赏识与认可。一旦脱离这些条件，同时期的其他女性诗人也很难走通同样的路。与此同时，薛涛的突围也有着无法突破的时代局限。她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男性士大夫文人的评价标准，她的诗名、她所制笺纸的价值，仍然需要通过男性文人的认可来确认。⁸² 第二章中所论的唐代乐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偏见，也是她无法真正摆脱的枷锁。终其一生，她都在男性主导的文学格局中，寻找可以让自己发声的有限空间。

不可复制的偶然性、特定条件的独特性以及难以逾越的时代限制，说明薛涛的性别书写是传统之内的突围，没有颠覆以男性文人为主导的中唐士大夫传统。但即便如此，薛涛的实践依然打破了中唐士大夫传统文化对如薛涛一样的女性创作者的限制：以乐籍女子的身份主动经入了原本由士大夫群体主导的文化活动，而非作为被观赏的客体与文化符号。这证明，即使在性别秩序森严的传统社会，底层女性创作者依然能通过贴合主流文化规则的创造性实践参与到文人文化交流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薛涛的性别书写从地理空间意涵塑造、意象性别书写、文化媒介创新三个层面参与中唐士大夫传统下的文化交流。她借此获得了进入主流文坛的机会，

⁸¹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页 46-47。

⁸²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页 51。

得以突破乐籍身份的桎梏；又尝试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生命感悟对士大夫传统进行改写和突围。她的突围，是传统之内的突围，没有颠覆既有的文化秩序。却在秩序之内，为女性创作者寻得自我表达的空间，这正是其性别书写的历史价值。

第五章 结语

薛涛作为中唐时期独特的女性诗人，其“乐妓—诗人—制笺人”的三重身份折射出唐代女性在士大夫传统文化中寻求主体表达的努力与困境。本论文通过对其诗歌文本、制笺实践与地理文化关联的多维考察，论证薛涛性别书写的核心本质——传统之内的突围。

她并未颠覆中唐士大夫传统的核心框架，而是以地理空间的意涵重构、核心意象的性别转化、书写媒介的创新突破三个维度主动接续了士大夫传统的三大核心内涵。同时以独有的女性生命体验，为以士大夫群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注入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以竹意象的自喻书写，突破了士大夫对比德符号的传统书写；以边塞、酬唱诗的题材突破，进入了属于士大夫的书写领域；以薛涛笺的创制与流通，打破了士大夫文人对文房用具与酬唱媒介的专属定义。

值得关注的是薛涛的突围具有时代偶然性与个体独特性。中唐文化的多元化趋势、蜀地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以及她跻身幕府文人圈的特殊经历，共同构成其“跨界”的历史条件。但这种突破并非完全的性别颠覆，而是在传统框架内寻找有限的表达缝隙——薛涛的创作价值仍需借助男性士大夫文人的认可得以确证。这种“在限制中创造”的困境，恰恰折射出唐代女性文化实践的普遍困境。

但薛涛的创作与实践，依然证明了女性在传统文化中并非被动附庸，而是能通过创造性实践重塑文化符号的能动主体。即使在女性创作长期被边缘化的传统社会，女性仍能通过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在历史记忆中刻下属于自己

的印记。这种突破或许微小而有限，却为理解中国古代女性的主体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她们的声音，从未完全消失在男性书写的宏大叙事之外

引用书目

古籍

1.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唐]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 [唐]薛涛著、傅润华编校，《薛涛诗》，上海：光华书局，1931。
4. [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专书

1.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3.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16。
4. 许总,《唐诗史(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5. 羊村,《女诗人薛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6. 应克荣,《细腻风光我独知——中唐女诗人薛涛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4。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8. 张正则等编著,《女诗人薛涛与望江楼公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期刊

1. 陈文华,〈唐代女诗人考略〉,《平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页7-10。
2. 何苇,〈试论薛涛诗作中植物意象的审美意蕴〉,《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27卷第3期,页88-89。
3. 黄芸珠,〈略论薛涛师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页67-70。
4. 赖丽娟,〈薛涛与蜀帅交往探析〉,《立德学报》2006年第3卷第2期,页101-120。
5. 林宇娇,〈中晚唐时期成都地区的笺纸工艺发展研究——以薛涛笺为例〉,

《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页6-7。

6. 刘天文,〈薛涛生年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6期,页112-115。
7. 卢丙华,〈薛涛诗中的竹文化及其英译〉,《海燕》2025第1期,页110-113。
8. 田文娟,〈薛涛诗中的女性身份认同〉,《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14期,页68-69。
9. 吴怀东,〈“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论杜甫草堂诗生活与环境景物描写及其思想史意义〉,《学术交流》2024年第1期,页175-192。
10. 谢元鲁,〈20世纪薛涛研究评述〉,《蜀学》2024年第23辑,页289-302。
11. 禹尚烈,〈薛涛与黄真伊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页97-100。
12. 张蓬舟,〈薛涛生卒究何年〉,《读书》1982年第9期,页152-154。
13. 张阳,〈新世纪以来唐代女诗人薛涛研究综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4卷第3期,页105-109。
14. 周维扬,〈杜甫与成都草堂〉,《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页34-37。

学位论文

1. 景炜,《唐代三大女诗人创作研究》,喀什:喀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21。
2. 王珊,《以薛涛笺为中心的早期笔纸制作工艺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史博士论文，2019。

3. 岳娟娟，《唐代唱和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论文，2004。
4. 赵钰，《白居易松竹诗歌研究》，汉中：陕西理工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24。

电子书

1. [明] 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HY0113/chapter/1kbmj78f80i79?paragraphId=7413321643818418227&page_from=reading_midpage。
2. [清] 常明等，《嘉庆四川通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7482039257507299347/chapter/1lgzbo8c9xye?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4
3. [清] 吴巩等，《光绪华阳县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9 日，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7501694217039642678/chapter/1lhqeldbtrls6?paragraphId=7567273541562220550&page_from=reading_midpage。
4. [清] 张晋生等，《乾隆四川通志》，识典古籍，访问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
https://www.shidianguji.com/zh/book/HY4587/chapter/1kt98oid5e9fj?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28¶graphId=7536830762570825778&lineId=2889&sentenceId=7579269125396070454。

附录

表 1 薛涛诗中浣花溪地理空间相关诗作统计表

	诗题	依据	论证	创作时期
1	《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	诗题含“浣花亭”	【笺】引《蜀记》：“亭在梵安寺，其先为杜公旧宅。”（杜甫草堂）地在浣花溪畔。	元和十三年（818年）后，脱籍退隐期
2	《菱苕沼》	“何时得向溪头赏”	薛涛脱籍后屏居浣花溪锦浦里，“溪头”即指浣花溪。	脱籍退隐期
3	《采莲舟》	“满溪红袂棹歌初”	同上，所写“溪”即薛涛居处浣花溪。	脱籍退隐期
4	《赠远二首·其二》	“春深花落塞前溪”	【笺】注：“前溪”即薛涛居处浣花溪。	元和五年（810年）后
5	《乡思》	“何日片帆离锦浦”	【笺】注“锦浦，锦浦里，在成都浣花溪。”	晚年退隐期
6	《送扶炼师》	“锦浦归舟巫峡云”	【笺】注同上，“锦浦”为浣花溪畔里名。	晚年退隐期
7	《春郊游眺寄孙处士二首》	“何事碧溪孙处士”	【笺】注：“碧溪”指碧鸡坊，在成都，邻近浣花溪。	晚年退隐期

注：本表以[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中收录的93首薛涛存世之作为样本统计而得。

表 2 薛涛诗中“竹”意象出现频次统计表

	诗题	涉及的“竹”意象	出现次数
1	《酬人雨后玩竹》	诗题有“竹”；“那鉴雪霜姿”“虚心宁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苍苍劲节奇”	5
2	《题竹郎庙》	咏蜀地竹王祠庙，体现竹崇拜文化	1

续表 2

	诗题	涉及的“竹”意象	出现次数
3	《十离诗·竹离亭》	诗题有“竹”；“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劲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	3
4	《赠段校书》	化用“竹林七贤”典，赞对方文采风流	1

注：本表以[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中收录的 93 首薛涛存世之作为样本统计而得。

表 3 薛涛存世诗歌主题分类统计表

主题类别	数量 (首)	占比 (%)	代表作品	分类依据
酬唱赠答	53	57.0%	《上川主武元衡相国》 《酬韦校书》《贼平后上高相公》 《寄旧诗与元微之》《十离诗》	含酬、和、寄、赠、送、上、献、陪等社交性作品
咏物抒怀	17	18.3%	《酬人雨后玩竹》《蝉》 《月》《风》《柳絮》 《金灯花》 《朱槿花》《牡丹》	借物喻志，寄托品格或身世之感
写景纪游	10	10.8%	《谒巫山庙》《题竹郎庙》 《赋凌云寺》《海棠溪》 《斛石山书事》	描绘山川寺庙等自然人文景观
感怀抒情	9	9.7%	《春望词四首》《乡思》 《秋泉》《江边》	直抒胸臆，表达思乡、叹老、孤寂等个人情志
边塞时事	4	4.3%	《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 《贼平后上高相公》《筹边楼》	涉及边塞战事、军旅生活及对时局的关怀

注：本表以[唐]薛涛著，张篷舟等笺注，《薛涛诗笺（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中收录的 93 首薛涛存世之作为样本统计而得。